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

人 民 出 版 社

04.3
211.3
C.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

1892 / 21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5印张 55,000字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36 定价0.17元

出版说明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对政治方面的意见不得不用暗示的方式来表述。因此，列宁说，读者如果对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沙文主义是彻底地背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相联系的等等问题关心的话，可以阅读他在1914—1917年在国外发表的有关论著。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需要，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历史趋势，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任务，批判新老修正主义的反动谬论，我们选辑了列宁的几篇有关论著，编成本书。

书中文章是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顺序排列的。译文采自《列宁选集》或《列宁全集》。对注释作了一些增删。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四年五月

目 录

打着别人的旗帜.....	1
论欧洲联邦口号.....	23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28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43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56
修改党纲的材料 (摘录)	74

打着别人的旗帜*

《我们的事业》^①第1期(彼得格勒,1915年1月)登载了亚·波特列索夫^②先生的一篇极有代表性的纲领性文章:《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跟这位作者前些时候在一本杂志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叙述了俄国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流派即取消派对当今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的基本观点。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文章,而是一个派别的宣言。只要仔细读一读这些文章,想一想这些文章的内容,谁都会看出,只是因为考虑到一些偶然的、即与写作的利益毫无关系的因素,作者(和作者的朋友们,因为作者不是孤单的)才没有用宣言或“信条”这种更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出来。

亚·波特列索夫的主要意思,是说现代民主派处在两个时代

* 《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列宁写于1915年2月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背叛社会主义,追随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波特列索夫等人,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帜,偷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私货。他们抹煞不同时代不同的阶级内容和社会内容,混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时代同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区别,把资产阶级进步时期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拿来为他们在资产阶级已经反动、腐朽的时代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保卫祖国”的反动立场辩护,以欺骗工人群众,掩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的罪恶行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谬论,对时代问题作了重要论述。

① 《我们的事业》,俄国孟什维克的杂志。

② 亚·波特列索夫(1869—1934),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

的交界点，而旧时代和新时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从民族狭隘性过渡到国际性。亚·波特列索夫所说的现代民主派，是指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民主派，它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的资产阶级旧民主派不同。

乍看起来，可能觉得作者的思想绝对正确，觉得作者是一位反对今天在现代民主派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自由派的人，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自由主义者。

的确，捍卫国际主义，把民族狭隘性和民族特殊性看作过去旧时代的特点，这岂不是同民族自由主义这种流行病，同现代民主派（确切些说，现代民主派的正式代表）的这种瘟疫断然决裂么？

乍看起来，不但可能，而且几乎必然会是这样。可是，这是根本错误的。作者是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他用了一个很小的军事机智（不管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反正都是一样），打出一面“国际主义”的旗帜，想在这面旗帜下面稳稳地偷运民族自由主义私货。因为亚·波特列索夫是一个明显不过的民族自由主义者。他的文章（和他的纲领，他的政纲，他的“信条”）的全部实质，就是用了这个很小的可说是幼稚的军事机智，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帜，偷运机会主义。这种实质必须十分详尽地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而亚·波特列索夫打着别人的旗帜之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他为了掩饰自己，不但搬出了“国际主义”的原则，而且还自称为“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拥护者。换句话说，亚·波特列索夫想当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代表者，而实际上他是用民族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亚·波特列索夫想“纠正”考茨基^①，责备他的“律师手法”，就是说，责备他一会儿替这个民族

^① 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

色彩的自由主义辩护，一会儿又替那个民族色彩的自由主义辩护。亚·波特列索夫想用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民族自由主义（因为毫无疑问，考茨基已肯定地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了）。实际上，亚·波特列索夫是用清一色的民族自由主义来反对杂色的民族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民族自由主义的，在当前的具体历史环境里，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是否真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来谈谈。

—

使亚·波特列索夫在民族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打转的不幸的关键就在于他文章里的下面这段话，如果读者仔细思索一下，就容易了解：

……“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他们（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总是秉着固有的气质前去克服，他们对冲突作出诊断，他们力求判断哪一方胜利会为他们所希冀的前途开辟更广阔的天地，从而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打下一定的基础”（第7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哪一方胜利比较好”——这是须要判断的，然而须要从国际的观点而不是从民族的观点来判断；这就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实质；考茨基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从“法官”（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律师”（民族自由主义者）。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的思想。亚·波特列索夫深信：自己坚持某一方（就是自己那一方）胜利比较好，决不是“耍律师手法”，而是从真正国际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另一方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是所谓“中派”，即以隐蔽的手法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公开反对十月革命，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和叛徒面目。

有“难以想象的”罪恶……

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①、普列汉诺夫^②等人都是根据真正国际的观点，得出了与波特列索夫相同的结论……这真是幼稚到……但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了，还是先把纯理论性的问题分析清楚吧。

马克思曾经判断过“哪一方胜利比较好”的问题，比如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③的时候就是如此。亚·波特列索夫所谈的，正是这个“由于具有某些特点而对我们有特别意义”的例子。我们也同意用亚·波特列索夫选择的这一个例子。

1859年拿破仑第三向奥地利宣战，似乎是为了解放意大利，其实是追求自己王朝的目的。

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在拿破仑第三的背后出现了刚刚同法国皇帝缔结秘密协定的哥尔查科夫^④这个人物。”矛盾错综复杂：一方是压迫意大利的欧洲最反动的君主国，另一方是包括加里波第^⑤在内的争取解放的革命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同反动透顶的拿破仑第三并肩携手等等。亚·波特列索夫写道：“何必自找麻烦呢，干脆说一声‘双方都坏’，岂不更简单么？但是，恩格斯、马克思、拉

① 马斯洛夫(1867—1946)，俄国的孟什维克，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原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堕落为修正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的首领之一。

③ 1859年意大利战争，指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与意大利的萨丁王国订立密约，以取得意大利的萨瓦和尼斯两地为条件，出兵帮助意大利收复被奥地利占领的土地。

④ 哥尔查科夫(1798—1883)，俄国外交大臣。1859年3月，俄法签订密约，俄国支持法国反对奥地利，法国支持俄国取消巴黎条约中关于禁止俄国在黑海保存舰队的条款。

⑤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民主主义者。

萨尔^①都没有被这种‘简单’的解决办法所迷惑，而是着手探寻”（亚·波特列索夫想说：着手研究和分析）“冲突怎样结局才对他们所珍视的事业最为有利。”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普鲁士应当干预。亚·波特列索夫自己承认，在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当中，有这样一些问题：“由于同敌对联盟冲突，德国的民族运动可能产生，可能违背德国许许多多统治者的心意而发展起来；在欧洲的共同行动上，哪一个大国是祸患的中心：是多瑙河沿岸的反动君主，还是这种共同行动中的别的著名代表人物。”

亚·波特列索夫推论说：是马克思对或是拉萨尔对，这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必须根据国际的观点来判断哪一方胜利比较好。

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所举的例子；这就是我们的作者的议论。亚·波特列索夫推论说：既然马克思当时能够不顾交战双方的政府都极为反动而“估计国际冲突”（亚·波特列索夫的说法），那末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作同样的估计。

这个推论真是太幼稚了，这种诡辩真是太笨拙了，因为这无非是说：既然马克思在1859年解决了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那末在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在1859年（和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马克思认为“哪一方胜利比较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亚·波特列索夫**没有看到**，在马

①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他宣扬通过争得普选权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他暗中与反动宰相俾斯麦勾结，支持普鲁士“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反革命政策。

克思解决这个我们都知道的问题的时候，当时存在着无疑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这种运动不但存在，而且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的历史过程中占着首要的地位。在我们今天，如果认为象英德这样一些无疑是欧洲“共同行动”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角色，还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有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那就可笑了。在这些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大国里，资产阶级旧“民主派”已经是反动的了。而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却“忘记”这一点，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来偷换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样去采取另一个阶级而且是衰亡的旧阶级的观点，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对新旧两个时代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分析，决不会说明这样做是对的。

正是资产阶级才力图玩弄亚·波特列索夫那种偷换的把戏，用资产阶级进步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解放运动的时代来偷换帝国主义时代，比如德国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英国资产阶级也是这样。亚·波特列索夫毫无批判地跟着资产阶级走。更不能原谅的是，亚·波特列索夫本人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和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在早已过去的时代里考虑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一）。

〔一〕顺便提一提，亚·波特列索夫不愿意判断这个问题：对1859年战争的条件估计，是马克思对还是拉萨尔对。我们（与梅林^①的意见相反）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②献媚的时候一样，是机会主义者。拉萨尔设法使普鲁士和俾斯麦胜利，使德意两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拉萨尔就动播到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反对拿破仑，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萨尔的眼睛不是朝下，而多半是朝上，瞅着俾斯麦。俾斯麦的“胜利”，决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列宁原注

① 梅林（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梅林有错误认识。

②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宰相，工人运动的死敌。他以血腥的反革命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第一、他们所考虑的是民族运动(德国和意大利的),是如何使民族运动违反“中世纪代表人物”的心意而发展起来;第二、他们所考虑的是欧洲共同行动中的反动君主国(奥地利君主国、拿破仑君主国等等)是“祸患的中心”。

这些看法是十分清楚和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心的即发生冲突的几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国家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东西**。过去在意大利和德国发生的都是长达数十年的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在财政上支持其余的几个大国,相反地,这些大国才真正是“祸患的中心”。亚·波特列索夫不会不知道,而且他自己在那篇文章里也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余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祸患的中心”。

资产阶级(比如德国资产阶级,虽然决不止它一个)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煽起民族运动的思想,力图把这种思想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即完全不同的时代来。机会主义者跟往常一样,总是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抛弃现代民主派的观点,采取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和他的取消派伙伴们所有的论文、立场、路线的根本罪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年代解决了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是想使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发展为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而在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年代,在英德法等国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进步运动、什么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和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的时候,亚·波特列索夫却来鼓吹资产阶级民族自由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自己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民族进步运动的时代前进了一步,推进了这些运动,设法使这些运动“违反”中世纪

代表人物的“心意”而发展起来。

亚·波特列索夫，和所有社会沙文主义^①者一样，从自己的现代民主派的时代向后倒退，转到早已过时的、陈腐的因而实际上是虚伪的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

因此，亚·波特列索夫向民主派发出的下面的这个号召，是极为糊涂、极为反动的。

……“不要后退，而要前进。不要走向个人主义，而要走向十分完整的、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后退；后退到恩格斯、马克思、拉萨尔那里去，运用他们估计国际冲突的方法；象他们那样，把各国的国际行动都用于民主主义的目的”。

亚·波特列索夫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而是在一切意义上拖着现代民主派后退，恢复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口号和思想，使群众依赖资产阶级……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当时，在1859年，欧洲大陆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资产阶级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是主要的动力。过了五十五年，站在原来反动封建主地位上的已经是和反动封建主一样的老朽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巨头了，而聪明过人的亚·波特列索夫还想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用新阶级的观点来估计国

① 社会沙文主义，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第一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得名。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这次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公然放弃革命斗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完全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际冲突〔一〕。

亚·波特列索夫没有好好想一想他这些话里的真理有什么意义。假定在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有两国交战。从当时的民主派的观点看来，希望哪一国胜利呢？显然是希望能够更有力地推动、更激烈地发展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更有力地摧毁封建制度的那个国家胜利。其次，假定客观历史环境的**决定**因素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已经被国际的、反动的、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代替了。假如一部分人占了非洲的四分之三，另一部分人占了四分之一。他们的战争的客观内容就是重分非洲。希望哪一方胜利呢？还象过去那样提问题，那简直是荒唐之至，因为过去的估计的标准，无论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长期过程，或者是封建主义崩溃的长期过程，现在都不存在了。无论是帮助前者巩固其四分之三的非洲的“权利”，或者是帮助后者（虽然后者在经济上比前者发展得快）夺取这四分之三，都不是现代民主派的事。

只有不附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有说“双方都坏”，只有希望每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失败，只有这样，现代民主派才是正确的。其余的一切决定，实际上都是民族自由主义，同真正的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但愿读者不要上亚·波特列索夫的奇异术语的当，他是用这些术语来掩饰他采取资产阶级观点的事实的。亚·波特列索夫喊道：“不要走向个人主义，而要走向十分完整的、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这是他拿自己的观点来反对考茨基的观点。他把考茨基（和

〔一〕 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似乎是停滞的时期，各国国内都发生了极大的分子分裂过程，国际环境渐渐变质了，因为夺取殖民地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成了国际环境的**决定**因素。”——列宁原注

考茨基之流)的观点叫做“个人主义”，意思是说考茨基不去估计“哪一方胜利比较好”，同时为每一个“个别”国家的工人的民族自由主义辩护。他说，可是我们，亚·波特列索夫、切列万宁^①、马斯洛夫、普列汉诺夫等，呼吁“十分完整的、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因为我们主张一个色彩的民族自由主义，决不是从个别国家的观点(或个别民族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真正国际的观点出发的……这种议论如果还不算很……可耻，那至少很可笑。

不管是亚·波特列索夫之流还是考茨基都当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背叛了他们竭力想代表的那个阶级的观点。

二

亚·波特列索夫给自己的文章加的标题是：《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

^① 切列万宁(1868—1938)，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

特点。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他的文章登在同一期的《我们的事业》杂志上)的诡辩的根本之点,或者说,两个人所共有的、使他们两人得出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族自由主义的结论的根本的历史性错误,正是在这一方面。

因为,亚·波特列索夫举出的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这个对他有“特别意义”的例子,以及考茨基举出的历史上的许多类似的例子,“恰恰不属于”我们生活于其“交界点”的“那些历史时代”。我们正在进入(或者已经进入,但还在开始阶段)的时代,我们叫做现代(或第三个时代)。我们刚刚走过的时代,叫做昨天的时代(或第二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举了许多例子的那个时代,我们就叫做前天的时代(或第一个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议论当中那种令人愤慨的诡辩和难以容忍的谎言,就是他们用前天的时代(第一个时代)的条件来偷换现代(第三个时代)的条件。

我们来看看吧。

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 1789—1871 年;(2) 1871—1914 年;(3) 1914—?。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里多次引用过,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亚·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里也是这样运用的。当然,这里的界限跟自然界和社会上所有的界限一样,是有条件的、活动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只是大致地挑出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是它的全盛时代。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说,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

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处于第一个时代的封建主所处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的时代。

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自己在一系列论文和《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1909年出版)里，十分肯定地描述过正在进入的第三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指出了这个时代同第二个时代(昨天的时代)的根本区别，认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民主派直接的任务以及斗争的条件和形式已经改变。现在，考茨基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烧毁了，而最令人难信地、最不体面地、最无耻地把阵线变换了。在上述小册子里，他直接说出了战争即将到来的征兆，而且说的正是1914年发生的战争。只要把这本小册子的一些地方同考茨基今天的大作对比一下，就会确信考茨基背弃了自己本人的信念和最庄重的声明。在这方面，考茨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人物(而且决不只是德国的现象)，在危机的关头滚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所有现代民主派上层分子当中，他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而已。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所举的历史上的例子，都是属于第一个时代的。不但在1855、1859、1864、1866、1870年的战争时期，而且在1877年(俄土战争)和1896—1897年(土希战争和阿尔明尼亚的骚动)的战争时期，历史现象的主要客观内容，都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或资产阶级社会力求从各种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痉挛”。在许多先进国家里，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民主派的那种真正独立的、与资产阶级过熟和衰落的时期相适应的行动。当时，在这些战争中，资产阶级是主要的阶级，它参加这些战争，处在

上升的阶段，唯有它才能以压倒的优势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当时各个不同国家的这种资产阶级，以各个**富有的**商品生产者阶层为代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进步性，有时甚至是革命的（例如 1859 年意大利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而这个时代的一般特点正是资产阶级有进步性，**就是说**，它同封建制度的斗争当时还没有完成，没有结束。十分自然，当时的民主派，包括他们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根据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能够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这个无可争辩的原则，解决了“哪一方”即**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胜利”比较好的问题。当时，在战争所波及的一些主要国家里，人民运动是一般的民主运动，也就是说，就其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十分自然，当时无法提出**别的问题**，而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应当进行什么样的联合，使什么样的反动的（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封建专制的）力量失败，使**什么样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才能给当时的民主派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而且正如亚·波特列索夫也不得不承认的，马克思在“估计”由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国际冲突时，他所考虑的是：哪一方胜利更能有助于民族运动和一般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亚·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的第 74 页）。这就是说，在某些民族中，由于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象在 1848 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马克思的这种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使运动发展起来的想法，就是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由派联盟的策略根本不同的地方。

第三个时代的国际冲突，在**形式上**仍同第一个时代一样，但是**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已经根本变了。客观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了。

上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资本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已经被极反动的、垂死的、过时的、走下坡路的、衰落的金融资本反对新生力量的斗争所代替。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第一个时代是摆脱封建制度的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支柱，而到了现在第三个时代，则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资产阶级从上升的先进的阶级变成了腐朽的、没落的、溃烂的、反动的阶级。正在上升的阶级（在广大的历史范围内）完全是另一个阶级了。

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抛弃了这个阶级的观点，向后倒退，重复资产阶级的谎言：似乎历史进程的客观内容在今天依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进步运动。实际上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民主派当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尾巴——不管这个资产阶级的“色彩”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时代的历史任务在客观上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应当怎样“利用”国际冲突来反对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使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赢得最大的胜利。在五十多年以前的第一个时代，被封建制度奴役的资产阶级希望“本国的”封建压迫者失败，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而且这些主要的、中心的、有全欧影响的封建堡垒是为数极少的。所以马克思才“估计”：在这样一个具体环境（形势）里，哪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对打破全欧的封建堡垒有更重要的意义。

现在，在第三个时代，全欧性的封建堡垒根本不存在了。“利用”当然是现代民主派的任务，但是这种国际性的利用，与亚·波特列索夫和考茨基的看法相反，不应当是去反对某些国家的金融资本，而应当是反对国际金融资本。而且应当来利用的，也不是五十——一百年前那个上升的阶级。当时的问题是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际行动”（亚·波特列索夫的话）；而现在历史上

产生的和客观情况提出的同样的任务，摆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面前了。

三

第二个时代，或者象亚·波特列索夫所说的“四十五年的时代”（1870—1914年），被亚·波特列索夫描述得很不全面。托洛茨基^①在德文著作中对这个时代的描述也是不全面的，虽然托洛茨基并不同意亚·波特列索夫的实际结论（这也许是托洛茨基比亚·波特列索夫高明的地方）。而且这两位作家对于他们的意见有某些接近的原因，未必都清楚。

关于我们所谓的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亚·波特列索夫写道：

“工作和斗争的分散琐碎，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这些被一部分人奉为原则的时代标志，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成了他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因而成了他们心理的因素，思想的色彩。”（第71页）“它（这个时代）的有计划地、有耐性地、小心谨慎地前进的才干，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显然不能适应渐进性已被破坏、各种灾难已经降临的时期，这是第一；第二是完全局限于民族行动——民族范围之内”（第72页）……“既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第70页）……“它的‘阵地斗争’的时期拖得愈长……在欧洲的心脏没发生过国际冲突，因而没有经历过超越民族国家领土以外的风波，没有锐敏地感觉到全欧或世界范围的利益，这样一个欧洲历史时期愈是长久地不离开舞台，那末民主派的民族化就进行得愈是顺

^① 托洛茨基（1879—1940），原是俄国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钻进布尔什维克党，窃据重要职务，顽固地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列宁逝世后，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进行反革命活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

利。”(第75—76页)

这段描述的根本缺点，同托洛茨基对这个时代的同样的描述一样，就是不愿意看见和不愿意承认在上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派的内部深刻矛盾。结果好象这个时代的现代民主派是完整的统一体，一般地充满了渐进主义，民族化了，不习惯于渐进性已被破坏和灾难已经降临的时期，堕落了，发霉了。

实际上不可能是这样，因为无可争辩的，与上述趋势并行的还有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工人群众的“生活”国际化了，——向往于城市，全世界的大城市的生活条件拉平了(平均了)，资本国际化了，在大工厂里，城市和乡村的、土著和外族的居民等混杂在一起，——阶级矛盾尖锐化了，企业主联合会更沉重地压迫工人联合会，产生了群众罢工这种更尖锐、更艰苦的斗争形式，物价飞涨，金融资本的压迫不堪忍受，等等。

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一点我们是知道得千真万确的。在这个时代里，现代民主派内部的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的斗争，并没有放过一个、简直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大国。虽然一般说来，时代带有“和平的”、“停滞的”、死气沉沉的性质，但是在每个大国里，这种斗争有时十分激烈，甚至发生分裂。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影响到现代民主派所有各个方面的生活和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同自由派的联盟，对军费开支的投票，对殖民政策的态度，对改良的态度，对经济斗争性质的态度，对工会中立的态度等等。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决不象波特列索夫和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在整个现代民主派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绪。不，这种渐进主义形成了一定的流派，在这个时期的欧洲，这个流派经常建立起一些派别，有时甚至建立起一些现代民主党。这个流派有自己

的领袖，自己的机关刊物，自己的政策，对群众有自己特殊的——特别是组织方面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个流派愈来愈依靠，而且可以说，终于完全“依靠了”现代民主派内部的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自然也把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带进了现代民主派的队伍；于是在议会议员、新闻记者和联合会的官吏这个阶层当中，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生存的特点，因而也造成其政治“方针”（方向，意向）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在工人阶级当中，或隐或现地、程度或大或小地产生出一种官僚和贵族。

拿占领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来说吧。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的是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者以及高级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等能够得到这些“大块蛋糕”的一点碎屑。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在殖民地和特权的利益当中“享用”一点油水，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就有过，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承认过和指出过。但是在当时，只有英国才有这种现象，而随着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先后占领大量的殖民地，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就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总之，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的“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不但象亚·波特列索夫所想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能适应渐进性已被破坏的时期”的现象，不但象托洛茨基所叙述的那样，产生了“可能主义^①”的倾向，而且它造成整整一个机会主义流

^① 可能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主张。他们宣布：只争取“可能”争得的东西，即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可能派”这个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派，这个流派把现代民主派内部同具有本民族“色彩”的资产阶级在共同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利益上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定的社会阶层当做靠山，直接地、公开地、十分自觉地、一贯地敌视一切关于“渐进性已被破坏”的观点。

托洛茨基（更不必说亚·波特列索夫）在策略上和组织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其根源就在于他害怕，或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承认机会主义流派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同我们今天的民族自由派（或社会民族主义）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事实。否认这种“成熟”和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践上至少会导致对于到处流行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或民族自由主义的）祸患感到束手无策。

一般说来，亚·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弗·科索夫斯基^①（他甚至替德国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费开支这种民族自由主义的行为辩护起来了）和托洛茨基都是否认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的联系的。

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昨天是“按机会主义”划分民主派，今天是“按社会民族主义”划分民主派，这两种划分并不完全相同。第一，我们马上就要谈到，这个理由事实上是不对的；第二，这个理由完全是片面的，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根本不足的。人物和团体从一方转到另一方，这不但可能，而且在每次社会大“动荡”的时候，甚至是必然的；某一流派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一定流派之间的思想联系没有改变，他们的阶级作用也没有改变。所有这些看法，谁都是知道的，无庸置辩的，今天还要来着重地谈，似乎很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上述作者们偏偏把它们忘记了。机会主义的基本阶级作用——也可以说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在于现

^① 马尔托夫（1873—1923）、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科索夫斯基（1870—1941），都是俄国的孟什维克。

代民主派的一些分子，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滚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机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谁要是害怕这些话有“派别性”，我们劝他花点功夫去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他是反对“派别性”的人的特别适宜的“权威”，不是吗？）对英国机会主义的评论。毫无疑问，经过一番研究以后，就会承认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在根本上、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阶级作用也完全是一样的。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主张资产阶级和它的对立体的联合或接近（有时妥协、结盟等等）。社会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也是这样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相近、相连甚至相同，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自然我们所根据的不是个人，也不是团体，而是对社会流派的阶级内容的分析，是从思想政治上对他们主要的本质的原则进行的研究。

如果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会问：社会民族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它会起作用，会有力量？谁不回答这些问题，谁就是一点也不懂社会民族主义，当然也就根本不能与它“划清思想界限”，尽管他在那里赌咒发誓，说他决心同社会民族主义“划清思想界限”。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社会民族主义是从机会主义里面生长出来的，它的力量正是机会主义给它的。怎么能够“一下子”就生出一个社会民族主义呢？这跟怀孕九个月以后“一下子”就会生小孩完全一样。在整整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的欧洲各国，机会主义的表现是不可胜数的，每一个表现都是一条涓涓细流，而今天“一下子”就汇合成一条社会民族主义的大河，虽然这条河还很浅（附带说一句：而且又浑又脏）。怀孕九个月以后，胎儿就要脱离母体；机会主义怀孕几十年之后，它的成熟的胎儿即社会民

族主义就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比起几十年来）脱离现代民主派。不管各种各样的好心人听到这种看法和言论以后会怎样大吵大闹，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但这是免不了的，因为这是从现代民主派的整个社会发展和第三个时代的客观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按照机会主义”分类和“按照社会民族主义”分类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不是就证明这些现象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呢？不能证明，就象十八世纪末，个别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会儿转到封建主方面，一会儿转到人民方面，并不能证明资产阶级的成长和1789年大革命“没有联系”一样，这是第一。第二，整个说来（我们说的正是整个），这种相同是存在的。且不拿一个国家为例，面拿许多国家为例，比如拿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瑞典、瑞士、荷兰、保加利亚等十个欧洲国家为例。只有三个加了着重号的国家似乎有些例外；在其余的国家里，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流派都造成了与社会民族主义相敌对的流派。试比较一下德国的著名的《月刊》^①及其敌人，俄国的《我们的事业》杂志及其敌人，意大利的比索拉蒂^②党及其敌人，瑞士的格雷利希^③的拥护者和格里姆^④的拥护者，瑞典的布兰亭^⑤和霍格伦^⑥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⑦和潘涅库克、果特^⑧等人，保加利亚的“共同事业派”^⑨和“捷

① 《月刊》，即《社会主义月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

② 比索拉蒂（1857—1920），意大利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

③ 格雷利希（1842—1925），瑞士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

④ 格里姆（1881—1958），当时是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⑤ 布兰亭（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之一。

⑥ 霍格伦（1884—1956），当时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

⑦ 特鲁尔斯特拉（1860—1930），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右翼首领之一。

⑧ 潘涅库克（1873—1960）、果特（1864—1927），当时都是荷兰社会民主党人。

⑨ “共同事业派”，又称“宽广派”，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因出版过《共同事业》杂志故名。

斯尼亚克派”^①。旧的分类和新的分类大致是相同的，这是事实，而完全相同的东西甚至在自然界最简单的事物里也是没有的，正象伏尔加河在卡马河流入以后同流入以前并不完全相同，婴儿和双亲并不完全相似一样。英国看来好象是例外，其实战前就有两个主要的流派，以两种日报（日报是流派有没有群众的最正确的客观的标志）为中心，即机会主义者的《每日公民报》和反机会主义者的《每日公报》。两种报纸都被民族主义的浪潮吞没了；但是，在拥护前者的人当中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在拥护后者的人当中有将近七分之三的人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的。通常人们只拿“英国社会党”^②同“独立工党”^③相对比，这样比是不对的，是忘记了后者同费边社分子^④、同“工党”^⑤实际上结成了联盟。这就是说，十国当中只有两国是例外；但也并不完全是例外，因为派别并没有换了位置，而只是浪潮吞没了（原因十分明显，用不着再谈）几乎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而已。无可争辩，这说明浪潮是多么厉害；但是，这丝毫不能推翻全欧的新旧两种分类相同的事实。

有人对我们说：“按机会主义”分类已经过时了，只有分为国际主义的拥护者和民族狭隘性的拥护者才有意义。这种意见是根本

① “捷斯尼亚克派”，又称“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的革命社会民主工党。

② 英国社会党，是英国社会民主党于1911年同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出现两派：一是以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一是以阿·英克平和费·罗特施坦等为首的国际主义派。1916年4月该党发生分裂，海德门等退出，国际主义派领导该党。

③ 独立工党，成立于1893年，是英国一个机会主义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党曾发表宣言反对战争，不久即转而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④ 费边社分子，指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

⑤ 工党，于1900年由工联、费边社等联合而成，最初叫“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名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首领们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不对的。“国际主义的拥护者”这个概念，如果不加具体说明，那就毫无内容，毫无意思，而一加具体说明，就得列举出与机会主义相敌对的标志。在实践上，这是更加正确的。如果拥护国际主义，而又不最彻底最坚决地反对机会主义，那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可能有个别这类人物，的确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但是，评论一个人不是凭他对自己的看法，而要看他的政治行为。这种不彻底不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其政治行为总是帮助或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流派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也自称为“国际主义者”（考茨基、连施、哈尼施、王德威尔得、海德门等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国际上一切具有他们那种思想方式的人都必须接近、协议、合并。机会主义者不反对“国际主义”，他们只是主张机会主义者的国际赞同和国际协议罢了。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5—135页）

论欧洲联邦口号*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①第四十号上发表过如下的消息：我们党的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决定把“欧洲联邦”口号问题延缓到报刊上讨论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时再来解决。^②

我们的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偏重于政治一方面。发生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宣言^③把这个口号直接叫做政治口号（宣言说：“当前的政治口号……”），同时，宣言不但提出了欧洲共和国联邦，而且还特别着重指出，“不举行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这个口号便是荒唐和虚伪的。^④

在对这个口号作政治评价的范围内，反对这样的问题提法，譬如说，以为这个口号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那是完全不对的。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

* 《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写于1915年8月。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作了创造性的发展。在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的照耀下，俄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从1908年2月出版到1917年1月。自1911年12月起，由列宁主编。

②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6页。

③ 即《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8—574页。

④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3页。

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是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恰巧相反，它们总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为它扩展基础，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新阶层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充满政治上经济上巨大震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整个时代。

固然，在举行革命推翻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君主制度首先是俄国的君主制度的条件下，把欧洲共和国联邦这一口号作为政治口号提出来，是无可非难的，但是还剩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即关于这一口号的经济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文明的”殖民强国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

资本已经具有国际性和垄断性。世界已经被少数强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欧洲四大强国，即英、法、俄、德四国，共有二亿五千万至三亿人口和将近七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它们所占领的殖民地却有近五亿（四亿九千四百五十万）人口和六千四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即差不多占地球面积的一半（地球面积除两极地区外，共有一亿三千三百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被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弄得四分五裂。亚洲这三个所谓半殖民地（其实现在十分之九已成了殖民地）国家，共有人口三亿六千万，土地一千四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欧洲面积一倍半）。

其次，英、法、德三国在国外的投资不下七百亿卢布。为要从

这笔令人快意的款项上每年得到三十多亿卢布的“正当的”收入，有百万富翁们的全国委员会即所谓政府为之服务，这些政府拥有陆军和海军，把“亿万富翁”的子弟“安置”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充当什么总督、领事、大使、各种官员、牧师之类的吸血鬼。

在资本主义最高发展时代，少数强国掠夺地球上将近十亿人口的事情，就是这样组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这样组织。放弃殖民地，放弃“势力范围”，放弃资本输出吗？谁这样想，就是把自己降到牧师的水平，每逢礼拜天向富翁宣扬基督教宽大为怀，劝他们周济贫民……如果不能每年拿出几十亿卢布，那就拿出几百卢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资本”的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①，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而要测验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战争以外，没有也不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

① 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法国人蒲鲁东（1809—1865）为代表。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通过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巩固小私有者地位，并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成为小私有者，以便保证“公平地”交换产品，达到社会“普遍幸福”，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他还主张立即消灭一切国家、组织和权威，建立“无政府”社会。他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

当然，各个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达成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端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的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一种在我们看来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联合和自由的国家形式，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为止。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

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借以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

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根据大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以后对这个问题的反复讨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得出了一个结论：欧洲联邦口号是不正确的。

（选自《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6—710页）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二国际^①真的不存在了吗？它的最有权威的代表，如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坚决否认这一点。因为除了断绝关系而外，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平安无事，——这就是他们的看法。

为了弄清真相，我们来看一看 1912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宣言^②，这个宣言所谈的恰恰是这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并且是由世界各国社会党通过的。应当指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敢从理论

*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1916 年 1 月发表在《先驱》杂志第 1 期上。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驳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为他们的可耻破产所作的诡辩，用巴塞尔宣言对照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言行，进一步揭露了他们背叛社会主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真面目。文章分析了社会沙文主义的阶级根源及其政治内容，号召革命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

① 第二国际成立于 1889 年 7 月，它是欧洲和北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集聚工人阶级力量方面，起过积极作用。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由于右派和“中派”把持领导权，而逐渐蜕化变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使第二国际彻底破产。

②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宣言，指第二国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 年 11 月 24—25 日）所通过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宣言严厉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准备战争的掠夺目的，号召各国社会党人进行坚决的反战斗争。宣言重申：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上来否认对每次战争作出具体的历史的估计的必要。

现在，当战争已经大打起来了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的机会主义者，还是考茨基派，都不敢否认巴塞爾宣言，也不敢拿这个宣言提出的要求同各国社会党在战时的行为相对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宣言充分地揭露了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的真面目。

宣言中既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也没有一个字谈到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更没有一个字谈到德国和四协约国^①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一）}现在处处向世界吹擂的那些东西。其实宣言也不能谈到这些东西，因为它所谈的一切，是绝对用不着这些概念的。宣言十分具体地指出了许多经济冲突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制造这次战争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到了1912年就完全显露了出来，并且引起了1914年的战争。宣言提到俄奥两国因争夺“巴尔干霸权”而引起的冲突、英法两国和德国之间（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之间！）因“在小亚细亚实行征服政策”而引起的冲突、奥意两国因在阿尔巴尼亚“争取统治权”而引起的冲突，等等。宣言把所有这些冲突都确定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基础上发生的冲突。可见，宣言十分明确地认为这次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保卫祖国的思想成了理论上毫无意思的、实践上荒谬怪诞的东西。豺狼进行斗争，是为了吞食别人的“祖国”。宣言根据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作了必然的结论：这次战争“决不能用什么人民利益这种借口来辩护”；它是由于“资本家要获取利润，各国王朝要实现其野心”而制造的。如果工人“自相

① 四协约国，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成帝国主义同盟的英、法、俄、意四国。

（一）这里所指的不是考茨基在德国的那些信徒个人，而是指国际上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摇摆于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实际上不过是机会主义的遮羞布而已。——列宁原注

残杀”起来，那简直是一种“罪行”。宣言就是这样说的。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是成熟的和衰败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崩溃的前夜，已经成熟到要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地步了。1789—1871年这个时期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摆在历史日程上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摆脱外国奴役。在这个前提下，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保卫祖国”，即保卫祖国不受压迫。这种看法现在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可是要把这种看法应用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应用于谁能更多地掠夺巴尔干国家和小亚细亚等等的战争，那是荒谬的。因此，那些主张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象小偷躲避他偷过东西的地方那样来回避巴塞耳宣言，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个宣言证明，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去掠夺别的国家，奴役别的民族。这就是“沙文主义”这个概念的主要内容。他们即使在“自己”祖国的所做所为是为了征服别人祖国的时候，还是主张保卫“自己的”祖国。

把这次战争看作是民族解放战争时所得出的是一种策略，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时所得出的则是另一种策略。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另一种策略。战争“将引起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危机，利用的目的不是为了缓和危机，不是为了保卫祖国，相反地，而是为了“激发”群众，为了“加速资本统治的崩溃”。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的事情，是不能够加速的。宣言认为：社会革命是可能的，因为它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熟，正是由于战争它才会到来。宣言援引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例子，即援引群众罢工和国内战争的例子说，“统治阶级”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有人象考茨基那样，硬说社会主义对这次战争的态度没有

被阐明，这是胡说八道。这个问题在巴塞尔大会上不仅讨论过，而且已经作了决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革命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策略。

有人竟完全避开巴塞尔宣言或避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个别领袖的言论或个别党的决议，这种伪善态度是极其令人愤慨的，因为第一、这些言论是在巴塞尔大会以前发表的；第二、这些决议并不是由世界各国党共同通过的决议；第三、这都是针对各种可能的战争，而不是针对当前这场战争说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欧洲各大强国间的民族战争时代已经由它们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代替了，巴塞尔宣言最先正式承认了这个事实。

如果认为巴塞尔宣言是一种空洞叫喊、官样文章、虚声恫吓，那就错了。宣言所揭露的那些人正是要这样来提问题的。但这是不对的。这个宣言无非是整个第二国际时代所进行的巨大宣传工作的结果，无非是社会主义者用各种语言向群众发表的数十万演说、文章和呼吁书的总结。宣言只是重复了茹尔·盖得^①在1899年所写过的东西，当时他抨击了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应付战争的政策，他谈过“资本主义海盗”引起的战争（«En garde!»^②第175页）；宣言只是重复了1909年考茨基在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所写过的东西，他在这本书里认为“和平”时代已经结束，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把巴塞尔宣言看作空话或错误，那就是把近二十五年来全部社会主义工作都看作空话或错误。有人指出通过宣言而不实行宣言是矛盾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对于这种指责所以这样不能忍受，是因为这个事实揭穿了第二国际工

① 茹尔·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中派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守卫去！》。

作中极其深刻的矛盾。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给机会主义提供了养料，它起初只是一种情绪，后来成了一种流派，最后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一个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操纵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们所以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只是因为他们发誓说，他们的全部“和平”工作都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这个矛盾好象是一个脓包，它总归要破裂的，结果也真的破裂了。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是否要象考茨基之流所做的那样，为了维持“统一”（与脓毒维持“统一”）把这块脓再挤进有机体中去，还是为了促进工人运动这一有机体的完全健康，必须尽快地和细心地把这块脓排除掉，虽然动这番手术要忍受一时的剧痛的。

那些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并在1914—1915年间捍卫护国思想的人背叛了社会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伪君子才能否认这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必须说明一下。

二

如果把全部问题看成个别人物的问题，那是荒谬的。考茨基问道（《Neue Zeit》① 1915年5月28日）：既然是普列汉诺夫和盖得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试问，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阿克雷里罗得代表四协约国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说（《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②，1915年苏黎世版，第21页）：既然是考茨基等等这样一些人物，试问，这同机会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都是在演滑稽剧。为了说明整个运动的危机，必须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经济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

① 《新时代》。

②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主义各个派别历史的联系。

1914—1915年战争期间护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各大强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瓜分世界和剥削世界，是为了压迫各族人民。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同“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走狗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法制，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①和伯恩施坦主义^②的直接继续和完成。

在1889—1914年这一整个时代，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趋向，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经常进行斗争。如今在各个国家里，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个主要派别。我们暂且撇开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所使用的那种以个别人物为口实的手法，只谈一谈许多国家的派别情况。我们现在就拿欧洲的德国、英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保加利亚、瑞士、比利时和法国这十个国家来说吧。在前八个国家中，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的

① 米勒兰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了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为资产阶级效劳。

② 伯恩施坦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爱·伯恩施坦（1850—1932），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争取改良，竭力鼓吹阶级合作，扬言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公然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修正”，是修正主义的始祖。

划分是同社会沙文主义派和国际主义派的划分相适应的。在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据点是《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和列金之流;在英国是费边社分子和工党(英国独立工党——I. L. P. 始终同他们结成联盟,支持他们的机关报,但是它在这个联盟中始终不如社会沙文主义派占优势,而在英国社会党——B. S. P. 内,国际主义派却占七分之三);在俄国这一派的代表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现在是《我们的事业》杂志)、“组织委员会”^①以及齐赫泽领导的杜马党团^②;在意大利是以比索拉蒂为首的改良主义者;在荷兰是特鲁尔斯特拉的党;在瑞典是布兰亭领导的党内多数派;在保加利亚是“宽广派”的党;在瑞士是格雷利希之流。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正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沙文主义发出了相当激烈的抗议。只有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例外,这里虽然也有国际主义派,但是力量很弱。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已经完成了的机会主义。它已成熟到与本国资产阶级和总参谋部实行公开的、往往是卑鄙的联盟的地步。正是这种联盟使它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拥有独占合法刊物和欺骗群众的垄断权。所以,如果到现在还把机会主义看作一种党内现象,那是很荒谬的。如果打算同大卫、列金、海德门、普列汉诺夫、维伯等一起去执行巴塞尔决议,那也是很荒谬的。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统一,就是同剥削其他民族的“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讲统一,就是使国际无产阶级分裂。这当然不是说,同机会主义者的决裂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办到,而只是说这种决裂在历史上已经成熟,它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说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已由

① “组织委员会”是当时俄国孟什维克的领导中心。

② 指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齐赫泽领导的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和平的”资本主义进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已经为这种决裂作好了准备。Volentem ducunt fata, nolentem trahunt^①。

三

资产阶级的聪明的代表人物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极力称赞现在以“护国派”(即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维护者)为首的社会党。因此各国政府不是赏赐给社会沙文主义首领们以阁员的位置(在法英两国),就是让他们享有合法地自由存在的特权(在德俄两国)。因此,在社会民主党最强大而且已经变成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反革命工党的事实最为明显的德国,检察署竟把社会民主党内“少数”与“多数”的斗争看作“阶级仇恨激发”的表现!因此,聪明的机会主义者极力设法使那些在1914—1915年间曾对资产阶级帮过大忙的旧党保持原先“统一”的局面。1915年4月,有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在反动的杂志《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②上用“莫尼托尔”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值得感谢的坦率精神表明了世界各国聪明的机会主义者的观点。莫尼托尔认为,要是社会民主党继续向右走的话,那对资产阶级是很危险的:“它应当保持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工人政党的性质,因为它一旦放弃了这一点,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政党来接受原先旧的政党所背弃的纲领,并把这个纲领表述得更加激进。”(《普鲁士年鉴》1915年第4期第50—51页)

莫尼托尔说得真中肯。英国自由党人和法国激进党人一向要求的,正是用响亮的革命词句欺骗群众,使他们相信劳合-乔治^③、

① 愿从者天引之,不愿从者天强之。

② 《普鲁士年鉴》是德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反动刊物。

③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资产阶级反动政治家,自由党首领。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

桑巴、列诺得尔^①、列金和考茨基之流，相信这些在掠夺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的人。

但是，莫尼托尔所代表的只是一种露骨的、粗鲁的、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行动却是隐蔽的、巧妙的、“诚实的”。恩格斯有一次曾经说过：“诚实的”机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是最危险的……^②举个例子来说吧：

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1915年11月26日）上写道：“反对多数的情绪正在增长；群众怀有反对心理。”“战后（只是战后吗？——尼·列·），阶级矛盾必将尖锐，这会使激进主义在群众中占上风。”“战后（只是战后吗？——尼·列·）激进派分子势必纷纷脱党，而加入从事反国会的（??应该说：国会以外的）群众活动的党，这对我们是一个威胁。”“由此可见，我们的党正分裂为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极端相反的营垒。”为挽救统一起见，考茨基竭力劝告国会中的多数，要他们允许少数分子在国会里发表一些激进演说。这就是说，考茨基想利用在国会内发表的一些激进演说，使革命群众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起来，然而这些机会主义者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他们早就操纵了工会，现在他们依靠同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紧密联盟又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考茨基的这种做法与莫尼托尔的“纲领”在实质上有什么差别呢？除了一些糟蹋马克思主义的甜蜜词句而外，没有任何差别。

考茨基分子乌尔木在1915年3月18日的国会党团会议上“警告”党团不要“把弦子拉得太紧；工人群众反对党团多数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概是印错了，应读作“莫

^① 桑巴（1862—1922）、列诺得尔（1871—1935），都是法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首领，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尼托尔主义的”)“中派”立场(«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 Material zum «Fall Liebknecht»». Als Manuskript gedruckt^①, 第67页)。由此可见, 还在1915年3月就有人代表**全体**考茨基分子(即所谓“中派”)承认了**群众**怀有革命情绪的事实!!然而过了八个半月以后, 考茨基却又主张使那些想和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党进行斗争的群众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起来”, 而且是利用一些响亮的革命词句提出来的!!

战争所以往往是有益的, 是因为它能揭破脓包和排除俗例。

让我们把英国的费边社分子同德国的考茨基分子比较一下。请看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1893年1月18日谈到费边社分子时所写的一段话:……“这伙野心家有足够的判断力来理解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把这番艰巨工作托付给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 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害怕革命”……(《与左尔格通信集》第390页^②)。

而在1893年11月11日, 恩格斯又写道:“这些妄自尊大的资产者对无产阶级装出一副大发慈悲的样子, 说要从上而来解放它, 只是它要明白, 它这样无知无识的群众不能自己解放自己, 要没有他们这批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悯人的老太婆大发慈悲, 它是什么也达不到的”……(同上第401页)。

在理论上, 考茨基瞧不起费边社分子, 正象慈善君子瞧不起穷光蛋一样。因为他是发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 他们之间在实践上有什么差别呢? 他们都在巴塞尔宣言上签过字, 并且又都象威廉二世^③对待比利时中立那样来对待这个宣言。而马克思

① 《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 关于〈李卜克内西案件〉的材料》。非卖品。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页。

③ 威廉二世(1859—1941), 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

则不然，他毕生斥责了那些力图扑灭工人革命精神的人。

考茨基拿“超帝国主义”的新理论来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理解的这种理论就是：排除“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并由“国际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制度”来代替（《新时代》杂志，1915年4月30日）。同时他又补充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根据来断定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能不能实现。”总之，这个“新阶段”的发明者仅以对这个“新阶段”的假定为根据，却不敢直接声明它“可以实现”，这样，他就在现时，在已经开始了的危机、战争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化的“阶段”上，背弃了他自己的革命声明，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难道这不是最可恶的费边主义吗？

俄国考茨基派的首领阿克雪里罗得认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国际化问题的重心是日常实际工作的国际化”，譬如说“劳保法和保险法应当成为工人国际活动和组织工作的对象。”（见阿克雪里罗得所著《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1915年苏黎世版第39—40页）十分明显，不但列金、大卫、维伯夫妇，就是劳合-乔治本人、纳乌曼^①、白里安^②和米留可夫^③等人也会完全赞成这样的“国际主义”的。阿克雪里罗得现在也和1912年那样，谈到非常遥远的将来时，谈到未来的国际“将发动（在战争发生时反对政府）和掀起革命风暴”时，是甘愿发表一些最革命的言论的。请看，我们是多么勇敢呀！但是，一谈到现在要支持和扩大群众中已经开始的革命骚动时，阿克雪里罗得便回答道，“要是我们直接处于社会革命前夜，象俄国1901年大学生游行示威（它预示着反专制制度

① 纳乌曼(1860—1919)，德国的反动政治家。

② 白里安(1862—1932)，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③ 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首领。

的决战即将到来)时的情况那样”,那末这种革命群众发动的策略“也许还有某些根据”。可是,此刻这一切全是“空想”、“巴枯宁主义”^①等等,这同科尔布、大卫、休特古姆和列金等人完全是一副嘴脸。

可爱的阿克雪里罗得忘记了一点,就是在1901年,在俄国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第一次“决战”会在四年以后——不要忘记,是在四年以后——到来,而且还是“不解决问题的”战斗。虽然如此,当时只有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得对,我们嘲笑了号召立刻实行冲击的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之流。我们只是劝工人到处驱逐机会主义者,尽力援助、加剧、扩大游行示威以及其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欧洲现在的情况同这很相似:如果号召“立刻”实行冲击,那是荒谬的。但是,以社会民主党人自诩的人,不动工人同机会主义者决裂,不尽力巩固、加深、扩大和加剧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和游行示威,那是可耻的。革命永远不会完全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在革命骚动开始时,谁也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并且在什么时候导致“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革命。考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奉送给工人的是一种陈旧的、腐朽的反革命意见。他们叫群众期待将来的国际一定是个革命的国际,而现在只应当保持、掩护和粉饰列金、大卫、王德威尔得和海德门之流的反革命分子的统治。与列金之流保持“统一”是准备“将来的”革命国际的最好办法,这难道还不明显么?

^①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因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14—1876)而得名。巴枯宁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把国家看做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实现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妄图篡政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制定的基本路线,阴谋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者对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把巴枯宁开除出第一国际。

德国机会主义者的首领大卫在回答我党中央委员会 1914 年 11 月 1 日发表的宣言时说,“力求把世界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那就是胆大妄为”(见《Die Sozialdemokratie und der Weltkrieg》——《社会民主党和世界大战》一书 1915 年版第 172 页)。这个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就不管这种转变在某一时刻会遇到多大困难,社会党人决不能放弃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渝的准备工作。”^①

(大卫也引证了这一段话,见该书第 171 页。)在大卫那本书问世的前一个月,我党发表了几个决议,其中把“系统的准备工作”解释如下:1. 反对军费开支;2. 打破国内和平;3. 建立秘密组织;4. 赞助战壕联欢的表示;5. 支持一切革命的群众行动^②。

大卫简直和阿克雪里罗得一样勇敢;他在 1912 年并不认为在战争发生时仿效巴黎公社,就是“胆大妄为”。

普列汉诺夫这个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人物关于革命策略的言论和大卫一样,他把这种策略叫作“愚蠢的梦想”。但是,让我们听听科尔布这个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的言论吧,他写道:“实行李卜克内西^③ 周围那些人的策略,就会使德国民族内部的斗争达到沸点。”(见《Die Sozialdemokratie am Scheidewege》——《处在十字路口上的社会民主党》一书第 50 页)

但是,什么是达到沸点的斗争呢?岂不是国内战争吗?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574 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39 页。

③ 李卜克内西,卡尔(1871—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他积极反对机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在掠夺战争中支持本国政府,在整个国会中只有他投票反对战争拨款。

我们党中央的策略大体上是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①的策略一致的，如果这个策略真象大卫、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考茨基等人所说的那样，是“胆大妄为”、“空想”、“冒险”、“巴枯宁主义”等等，那它就根本不能引起“民族内部的斗争”，更不必说引起达到沸点的斗争了。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引起过民族内部的斗争。而事实却表明：正是在1915年，由于战争引起了危机，各国群众的革命骚动日益增长：在俄国发生了罢工和政治示威运动，在意大利和英国发生了罢工运动，在德国发生了饥民游行和政治示威。难道这不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已经开始的表现吗？

支持、发展、扩大和加副群众的革命行动，建立秘密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甚至在“自由的”国家里也无法向人民群众说明真相），——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次战争中的整个实际纲领。其他一切，不管用什么样的机会主义理论或和平主义理论来粉饰，都是谎言或空话〔一〕。

当人们向我们说这个“俄国策略”（大卫的说法）不适于欧洲的时候，我们总是用事实来回答的。10月30日在柏林，该市妇女同志代表团来到党主席团前声明说：“现在，我们有巨大的组织机构，要散布秘密的小册子和传单，要举行‘未经许可的会议’，比在反社

① 国际社会党人于1915年9月在齐美尔瓦尔得（瑞士）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之间展开了斗争，列宁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

〔一〕 我党中央的女代表们在1915年3月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建立秘密组织的绝对必要性。这一点被否定了。英国的女代表们讥笑这个建议，而赞美英国的“自由”。但是，几个月以后，我们却收到了一些开了天窗的英文报，例如《工人领袖报》（《Labour Leader》）^②，后来又得到消息说，在那里发生了警察搜查和没收小册子，以及逮捕那些在英国谈论和平而且只是谈论和平的同志并判处刑罚的事情！——列宁原注

② 《工人领袖报》创刊于1890年，后来成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机关报。

会党人的法令施行期间容易得多了。”“办法和手段并不少，显然，只是不愿意干。”（《伯尔尼哨兵报》^①——《Berner Tagwacht》1915年第271号）

难道是俄国的“宗派主义者”等把这些坏同志引入歧途的吗？难道代表真正群众的不是这些同志，而是列金和考茨基吗？是那个在1915年1月27日作报告时大骂过建立秘密组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列金吗；是那个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在11月26日，即在柏林举行上万人游行示威的四天以前说街头游行示威是“冒险”行动的考茨基吗！！

空话已经听够了，象考茨基之流那样糟蹋“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已经看够了！在第二国际存在了二十五年之后，在巴塞尔宣言发表之后，工人们再不会相信空话了。机会主义已经衰败了，它最终地转到资产阶级营垒，变成社会沙文主义了；它在精神和政治上都已同社会民主党决裂了。它在组织上也会同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工人已经在要求发行“不受检查的”刊物和举行“未经许可的”会议了，就是说，他们要求成立地下组织来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以战争反战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行动，而不是空话。这种行动尽管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尽管会有暂时的失败，错误，迷误和间断，但是，它一定会把人类引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选自《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12页）

^① 《伯尔尼哨兵报》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在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和瑞士,在那些同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要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话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人民武装”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①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我们在罗·格里姆最近提出的提纲^②中也看到了对“废除武装”这种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③和《先驱》杂志^④也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立场。



主张废除武装的主要论据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显、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写于1916年9月。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废除武装”的错误口号,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理论,指出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武装无产阶级的极端重要性。文章还再次表述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原理。

① 《青年国际》是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是接近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

② 指瑞士社会民主党首领格里姆在1916年夏因筹备召开瑞士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而草拟的军事问题提纲。

③ 《新生活》杂志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宣传齐美尔瓦尔得右派的观点。

④ 《先驱》杂志是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可是，在这个主要论据中，恰恰包含有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主要错误。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而且也不可能反对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因而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受它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己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①的提纲第五条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已不可能有任何民族战争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二十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中，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出于我们所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而叫作“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和尖锐化。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②在自己的小册

① 《国际》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1915年创办的杂志。环绕《国际》杂志，形成了国际派。从1916年起，国际派开始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国际派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但国际派也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犯有错误，如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等。列宁对国际派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② 尤尼乌斯是罗·卢森堡写《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时所用的笔名。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首先肯定了罗·卢森堡这本书的革命内容，同时又极其深刻地批评了其中的重大缺点和错误。罗莎·卢森堡（1871—1919）是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女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19年1月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反动政府杀害。

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她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引起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也是帝国主义的大国的干涉，因此，任何民族战争都会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据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可能发生，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假如我们声明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把各交战国弄得精疲力尽而结束了），“不可能”发生“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比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历史上显然是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是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民的民族的，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反对“我们”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国内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是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不但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

公然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认为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①，他是完全正确的。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最终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东西，即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工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最艰巨、最需要斗争的工作，那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甫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想，不愿意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让人家用词句来欺骗我们。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次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忘掉去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在这次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就是认为这次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这只能这样理解，绝对不可能有别的理解，因为侵入别国在任何战争中都是免不了的。就被压迫民族方面说来，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否认“保卫祖国”，或者就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说来，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②的战争中否认“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

^② 加利费(1830—1909)法国的反动将领，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如果忘记一切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大强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和培植反对民族压迫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注意到下面这个一般的理由。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这个道理很简单，几乎用不着作特别的说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用军队镇压罢工者就够了。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而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念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

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①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流血和死亡等等，那我们就应当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尽头的恐怖。如果现在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给这个社会准备恐怖的结局，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合理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废除武装（正确些说，梦想废除武装），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个是托拉斯的作用和妇女在工厂中劳动的作用；另一个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情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要求”这种发展，不“支持”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在工厂中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时代。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① 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想流派。它给基督教教义加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鼓吹基督教才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才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灾难。它的实质是欺骗劳动人民，反对社会革命。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壮丁军事化，而且使青年也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于这些，我们应当说：这太好了！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推翻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末他们怎么会被青年等等的军事化吓倒呢？这并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也不是什么空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重演这些事实表示怀疑，那就真正糟糕透顶了。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在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呵！”在公社时期，妇女和十三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作战。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消极地眼看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坏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1871年那样拿起武器，于是目前这些被吓倒了民族，正确些说，目前这个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无疑会、虽然迟早不定但绝对无疑会发展成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已经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会引起包括中立国和小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无产阶级的妇女对这种现象怎么办呢？只去咒骂一切战争和军事行动，只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无产者需要这门科学，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象当前的战争中所做的

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为了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而不是靠善良的愿望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如果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拒绝正是在当前的战争中进行这种宣传，那就最好干脆别说关于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人民武装”这一纲领性的条文，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的让步。我们在前面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要求不能接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要求和由此产生的幻想必然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是国际当前的主要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得^①和昆塔尔^②的一个主要缺

① 齐美尔瓦尔得是瑞士的一个地名。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在这里举行，故称齐美尔瓦尔得会议。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认为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通过这次代表会议的斗争，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团结起来了，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分离开了。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机会主义的问题，没有采取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没有接受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建立第三国际。

② 昆塔尔也是瑞士的一个地名。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于1916年4月在这里举行，故称昆塔尔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左派比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更加团结更加有力了。昆塔尔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解决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存在的基本问题。

点，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恰恰在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来，更不用说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内部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一个是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之流的先生们露骨的、无耻的、因而也是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另一个是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劳动派”^①，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其他“独立工党”的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露骨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内阁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②（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和平主义的口号，来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联盟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活动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

① 社会民主劳动派，又称劳动友谊社，是德国中派的组织。

②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沙皇俄国大资产阶级为了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于1915年成立的。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工人团”，诱骗工人代表参加，以便鼓动工人群众提高军需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孟什维克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策划的这种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勾当；布尔什维克则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胜利地进行了抵制。

对于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具体问题以及革命的其他具体问题闭口不谈，掩盖躲避，即使谈，也唯恐触犯警察的禁令。尽管战前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中又正式地指出过这一未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正是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重演悲剧的可能性，尽管群众一再爆发出不平和不满的情绪，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成长起来，人类还会经受（在最坏的情况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我们赞成的改良纲领也应当是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假如我们单让机会主义者去争取改良，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机会主义者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正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1914—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承认保卫祖国，这只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而已。”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的做法，在理论上要正确得多，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要难堪得多。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本国’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文钱和一个人”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也“不用一文钱和一个人”去帮助资产阶级民兵，即使象在美国、瑞士、挪威等等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特别是在1907年和1911年，被收买来当作军队去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来选举军官，取消一切军法制度，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类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愈来愈多地、愈来愈无耻地剥削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研究军事的自由协会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給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军事。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当然不能单用纲领去同机会主义作斗争，而应当实行始终不懈的监督，使纲领真正实现。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言行不符，养成了虚伪和好说无耻的革命空话的习惯（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这种社会思想，是从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并能够影响一定社会阶层的思想，而不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是在个别小国的特殊的、分外“安宁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想一直站在一旁。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想一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据就够了。他们说：“我们国小兵少，我们对大国毫无办法（因此也就无力

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同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继续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中立等等。”（大概象比利时那样的“永久”吧？）

许多小国想始终站在一旁的小打算，只想远远离开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搏斗，利用自己比较独占的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状态的小资产阶级愿望，——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受到一定欢迎和得到一定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打算是反动的，完全建筑在幻想上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中去的。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就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垄断同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尽量有利地、尽量安静地利用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

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操着三种世界语言，并且正是操着与瑞士毗邻的那些交战国的语言。

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缴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捐”，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而用三种语言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在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散发，说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的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象《哨兵报》^①、《民权报》^②、《伯尔尼哨兵报》这几家优秀的报纸就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这样做，阿劳党代表大会^③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出色的决议而已。

现在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是：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适合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方向呢？显然，是不适合的。“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的带有极浓厚的民族性、特殊的民族性的纲领，决不是国际主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的纲领。

（选自《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71—882页）

① 《哨兵报》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经沙特尔州党组织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期，该报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

② 《民权报》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和苏黎世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曾登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后来该报采取了反共反民主的立场。

③ 阿劳党代表大会，指1915年11月20—21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上就当时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建议必须展开反对战争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议案。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 运动中的分裂*

机会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取得的异常可鄙的胜利,是否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呢?

这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现在我们有可能而且应当来分析这个根本问题,因为我们在我们党的书刊上已经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如下两点:第一、我们这个时代和当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第二、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及其相同的思想政治内容。

首先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确切完备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垄断制有五种主要表现:(1)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2)大银行占垄断地位,三五个大银行支配着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3)原料产地被托拉斯和金融

*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写于1916年10月。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完备的定义,揭露了考茨基为掩饰帝国主义的矛盾而进行的理论捏造,论述了机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指出必须同机会主义实行分裂,必须同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

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和银行资本溶合起来的垄断工业资本）；（4）国际卡特尔开始瓜分世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经在**一百个以上**，它们占据了**全部**世界市场，并且“和陆地”进行瓜分（当战争还没有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5）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美西战争^①（1898年），英布战争^②（1899—1902年），日俄战争^③（1904—1905年）以及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④，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标志。

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第一、这表现在腐朽的趋势上，这种趋势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现象。共和民主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君主反动派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所以日益消失，正是因为两者都在活生生地腐烂着（这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迅速的发展）。第二、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专

① 美西战争：美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对西班牙发动的战争。战争结果，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得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古巴形式上宣布独立，实际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② 英布战争：是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伦治自由邦）发动的战争。战争结果使这两个共和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③ 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和俄国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次战争中获胜。

④ 欧洲1900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首先由西欧的金融危机开始，而后扩展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持续了三年，席卷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日本等国。这次危机大大加速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形成，进一步确立了金融资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五十亿至八十亿法郎。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第四、“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是帝国主义的特性。贿赂收买风行一时，类似巴拿马案件^①层出不穷。第五、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罗马的无产者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现代无产者过活。西斯蒙第^②这个深刻的见解，马克思曾特别加以强调。^③现在帝国主义稍微改变了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部分地也依靠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过活。

不难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开始。帝国主义造成的大规模的劳动社会化（即辩护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交错”的东西），其含义也是一样。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定义，就不免要同卡·考茨基完全抵触，因为他不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断定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力图兼

① 巴拿马案件，指1892—1893年在法国被揭露的法国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收买国事活动家、官员和报刊的大舞弊、大贿赂案件。

② 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0页。

并“农业”国^{〔一〕}。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工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金融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力图兼并农业国，而且还力图兼并一切国家。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割裂开了，来为他的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裁军”、“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这种理论捏造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实行“统一”的理论辩护。

考茨基的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已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党人》^①上详细论述过了。我们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以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彼克塔托尔为首的“组委会分子”，还有马尔托夫、大体上托洛茨基也不例外，都认为最好避开不谈考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问题。他们不敢公开维护考茨基在战时所写的东西，而只是捧一下考茨基（如阿克雪里罗得所写的一本德文小册子，组织委员会曾答应把它印成俄文）或援引几封考茨基的私信（如斯彼克塔托尔）来敷衍了事。考茨基在这些信里硬说他持反对派的立场，而狡猾地试图完全否认自己的一切沙文主义言论。

〔一〕“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考茨基于1914年9月11日在《新时代》^②上发表的论文）——列宁原注

① 《共产党人》，是列宁主办的一个杂志，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于1915年在日内瓦出版，只出了一期双刊号。

② 《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秋在新图加特出版。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許多文章，同时经常批评该刊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恩格斯逝世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应当指出，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无异于粉饰帝国主义的“见解”，不仅比希法亭^①的《金融资本》一书后退了一步（虽然希法亭本人现在也极力拥护考茨基，并且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而且比社会自由主义者约·阿·霍布森^②也后退了一步。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丝毫不想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是他在他的1902年的著作〔一〕中却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远为深刻的定义，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了远为深刻的揭露。请看这位著作家（在他那里几乎可以找到考茨基的所有一切和平主义的和“调和主义的”陈腐见解）对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这一极重要的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吧：

霍布森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老牌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

“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从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口中唱出这种关于帝国主义者的“盲目症”的调子来，要比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口中唱出来适当得多），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方面

① 希法亭(1877—1941)，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第一次大战期间是中派分子；大战以后，炮制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颂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17年起，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② 霍布森(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主张各帝国主义相联合，以“改善”资本主义，保证所谓的“永久和平”。

〔一〕 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J. A. Hobson, «Imperialism») 1902年伦敦版。——列宁原注

最严重的是英国。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的大量常备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非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现代英国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食利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很难预料，所以不能预先肯定只有这一种前途或其他任何一种前途。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

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末这些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不知道，只有革命无产阶级，而且只有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才能实行这种“抵抗”。这正是他作为社会自由主义者的本色！不过，他早在1902年就出色地考察了“欧洲联邦”（请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饰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即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道，正是朝着靠剥削亚非两洲以建立帝国主义欧洲的方向共同努力的；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现在战胜了（能长久吗？）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之间的这种极深刻的经济联系，不仅在我们的一些论文中，而且在我们党的一些决议中都一再指出过。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考茨基主义者却宁愿回避这个问题！例如，马尔托夫还在他所作的几次专题报告中就进行过诡辩，他的那番话登载在《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①上（1916年4月10日第4号），原文如下：

——“……如果那些在智力发展方面最接近于‘知识界’的最熟练工人竟也注定要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而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那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是很糟糕的，甚至是绝望的……”

玩弄一下“注定”这个愚蠢字眼和某种“捏造把戏”，就把某些工人阶层转到机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事实回避过去了！而组织委员会的诡辩家们正是要回避这一事实！他们用考

^① 《组织委员会国外书记处通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

茨基主义者希法亭以及其他许多人目前所炫耀的“官场乐观主义”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客观条件一定会保证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革命派的胜利！说什么他们都是些对无产阶级抱“乐观主义的人”！

其实，所有这些考茨基主义者，如希法亭、组委会分子以及马尔托夫之流，不过是对……**机会主义抱乐观主义**罢了。实质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产儿，而不仅仅是欧洲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产儿。当然，从世界范围看来，“无产阶级”迟早——早五十年或迟五十年，从**这一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小问题——“会”统一起来，而革命社会民主党“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但是，考茨基主义者先生们，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你们**现在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机会主义者**献媚讨好**，而这些人对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说来是**异己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奴仆、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不摆脱**这些人，工人运动始终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你们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即同列金、大卫之流，同普列汉诺夫、契恒凯里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统一”，这在客观上就是掩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得力代理人去奴役工人。革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胜利，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只有**反对你们**，这种胜利才能到来而且一定能到来，才能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这种胜利也就是对于你们的胜利。

现代工人运动中的这两种倾向，甚至是**两个派别**，在1914—1916年间已经十分明显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决裂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数十年内，大约从1858年到1892年这段时期内，在**英国仔细地考察过**这两个派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没有活到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

义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最早也只能说是在1898—1900年间开始的。但英国的特点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种例外情形时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现象是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有联系的。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①恩格斯在1872年9月21日给左尔格^②的信中写道:黑尔斯(Hales)^③在国际联合会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大风波,投票谴责马克思,因为他说过“英国工人领袖被收买了”。马克思在1874年8月4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至于说到此地〈英国〉的城市工人,遗憾的只是那帮领袖都没有进入议会,不然这倒是摆脱这帮混蛋的一条最可靠的道路。”^④恩格斯在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里说到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

② 左尔格(1828—1906),第一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生于德国,曾参加德国1848年革命,1852年移居美国,组织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1876年积极参加创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③ 黑尔斯(生于1839年),英国工联主义者。曾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后来反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及其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夺取第一国际在英国的组织的领导权。1873年被开除出国际。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7页。

的英国工联^①”^②。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人和自由激进党人，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③

恩格斯在1889年12月7日写信对左尔格说：“……这里〈英国〉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respectability）……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④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意味着什么了。”^⑤他在1890年4月19日的信中说：“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暗中向前发展着，席卷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而且往往是那些至今处于停滞状态的、处在**最低层**〈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运动着的力量。”^⑥恩格斯在1891年3月4日写道：“分崩离析的码头工会失败了，战场上将只剩下一些**富足的**因而也是胆怯的‘旧的’保守的工联……”他在1891年9月14日写道：在工联新堡代表大会上，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旧工联主义者失败了，“资产阶级的报纸

① 英国工联是指英国的职工联合会。它们是按行业组成的。最早的职工联合会成立于十八世纪。1868年，建立了全国性的职工联合会组织——英国职工联合会。英国工联的领导权长期落在工人贵族手中，他们主张同资本家合作，宣传劳资协调，奉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8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

④ 汤姆·曼（1856—1941），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英国独立工党的左翼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国际主义的立场。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

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91页。

也承认了**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失败**……〈所有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①

恩格斯曾把他数十年来反复说明的这些思想在书刊上公开发表，他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所写的序言^②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个序言中谈到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谈到了“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和“广大工人群众”相对立的事实。工人阶级中间只有那些“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英国在1848—1868年的特权地位所提供的“长期的利益”，而“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新”工联即非熟练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在英国被称为“所谓工人代表”的那些人，“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

我们故意相当详细地摘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坦率的言论，是想使读者能够全面加以研究。这些言论是必须研究的，是值得细细玩味的。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条件要求我们在工人运动中所采取的那个策略的**关偏**，正是在这里。

考茨基在这里依然企图“把水搅浑”，企图用同机会主义者调和的甜言蜜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坦白的、天真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连施之流）说德国进行战争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垄断地位，考茨基在同他们论战时用来“**纠正**”这种明显的谎话的不过是另一种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4、151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1—287页。

明显的谎话罢了。他用娓娓动听的谎话代替了厚颜无耻的谎话！他说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早就被粉碎了，早就被破坏了，因此也就用不着再来破坏，无须再来破坏了。

这种论据的虚伪性何在呢？

第一、就在于它把英国的殖民地垄断地位回避过去了。而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早在三十四年以前即 1882 年，就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种垄断地位！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虽然已被破坏，但是其殖民地垄断地位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了，因为全世界被瓜分完毕了！考茨基用甜蜜的谎言作幌子，偷运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机会主义市侩的货色，妄说“没有什么东西非要用战争来争夺不可”。恰巧相反，现在资本家不仅要用战争来争夺东西，而且为了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

第二、为什么英国的垄断地位造成了机会主义在英国的胜利（暂时的胜利）呢？因为垄断地位能提供超额利润即超过全世界一般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利润的额外利润。资本家可以从这种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甚至是不小的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建立某种同盟（请回忆一下维伯夫妇所描写的英国工联同它们的雇主的名“同盟”吧），即本国工人同本国资本家共同反对其他国家的同盟。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被破坏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破坏得怎样呢？是不是一切垄断都消失了呢？

如果是这样，考茨基主张调和的（同机会主义调和的）“理论”倒会有些根据了。但问题就在于并不是这样。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每个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以及每个大银行，都是一种垄断组织。超额利润并没有消灭，它仍然存在。一个享有特权

的财政上富足的国家剥削其他一切国家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变本加厉了。少数富强国家（就独立的和真正庞大的“现代”财富来说，这样的国家只有四个，即英法美德）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万万以至数十万万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万万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政治实质就在于此，而考茨基不仅没有把此中最深刻的矛盾揭示出来，反而把它们掩盖起来了。

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每年拿出一两亿法郎，在经济上收买“本国”工人中间的上层分子，因为他们的超额利润大概有十亿之多。至于这点小恩小惠怎样分配给工人部长、“工人议员”（请想一下恩格斯对于这个概念的卓越分析吧）、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工人官吏、狭隘行业工会工人以及职员等等，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在1848—1868年以及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只有英国一国享有垄断权；因此机会主义能在英国得势数十年；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占有过如此丰富的殖民地或工业垄断权。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是过渡到帝国主义新时代的时期，这时享有垄断权的已经不是一国的金融资本而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大国的金融资本了（在日俄两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由于这种不同的情况，从前英国的垄断权才可能存在几十年而不受争夺。现代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则已遭到疯狂的争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从前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可能被收买腐化几十年。现在这就很难办到了，甚至办不到了，但是收买为数较少的（与1848—1868年的英国相比较）“工人贵族”阶层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每一个帝国主义

“大”国都在这样干。从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用恩格斯的寓意极深的话来说——只能在一国内形成（因为当时只有一国拥有垄断权），但是能维持很久。现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和典型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卷进了瓜分赃物的疯狂斗争中，这种党也就未必能在许多国家里得势很久。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

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强的民族变为“永远”叮在他人身上的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坐享“清福”，用装备着杀人利器的最新军国主义制度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到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当前工人运动的历史必将在这两种趋势的斗争中逐渐展开。因为前一种趋势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经济“根源”的。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产生了、养育了和为自己提供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象意大利比索拉蒂之流的成形的十足社会帝国主义的党，同波特列索夫、格沃兹迭夫、布尔金、齐赫泽、斯柯别列夫之流的半成形的所谓的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重要的是，工人贵族阶层分离出去而投靠资产阶级的过程，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完成了，面要为这种经济事实和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找到一种适当的政治形式，是不怎么“费劲”的。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关，如报刊、议会、各种团体和代表大会等等，就替那些恭顺驯良的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职工们，创造了一种同他们经济上的特权和小惠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小惠。内阁或军事工业委员会、议会和种种委

员会内以及“庄严的”合法报纸编辑部或同样庄严的“唯资产阶级之命是听的”工人联合会理事会内的安稳的肥缺，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用来诱惑和嘉奖“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代表人物及其拥护者的东西。

政治民主制的机构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运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选举是不行的，没有群众是行不通的，而要在印刷术异常发达和议会制度盛行的时代诱惑群众，就必须有一套广泛施展、一贯推行、周密布置的手法，来阿谀奉承、制造谣言、欺骗敲诈、玩弄流行的时髦字眼、信口答应工人实行种种改良和增进种种福利，只要他们肯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把这套手法叫做劳合-乔治主义，因为英国大臣劳合-乔治是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典型国家里玩弄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劳合-乔治是一个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滑头政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演说家，他善于在工人听众面前乱吹一通，甚至讲一些最最革命的词句，他善于向驯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许诺实行社会改良（保险等等），他出色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一〕，并且正是在工人中间替资产阶级服务，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着资产阶级影响，即在一个最有必要而最难于在精神上征服群众的地方传播着这种影响。

试问，劳合-乔治同谢赫曼、列金、韩德逊、海德门、普列汉诺夫以及列诺得尔之流是否有很大区别呢？有人会反驳说，在后者中

〔一〕 不久以前，我在一种英文杂志上读到劳合-乔治的一位政敌托利党人^①写的一篇文章：《托利党人眼中的劳合-乔治》。战争打开了这位政敌的眼睛，使他看到劳合-乔治是资产阶级的一名多么出色的帮办！托利党人已经同他和解了！——列宁原注

① 托利党是英国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政党，成立于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间有些人会回到马克思的革命社会主义方面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从政治上即从大的方面来看，这是一种程度上的微不足道的区别。在今天的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中间可能有个别人会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但是，社会沙文主义或（完全是一回事的）机会主义的流派却不会消失，也不会“回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这个政治流派，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事实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流派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俄国的齐赫泽党团、《我们的事业》杂志、《劳动呼声报》^①以及国外的“组委会分子”，都无非是这样一个党的变种罢了。我们根本不能设想这些党派会在社会革命以前消失。恰巧相反，这个革命愈迫近，爆发得愈猛烈，革命进程的转变和飞跃愈急剧，则群众革命潮流反对机会主义市侩潮流的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愈大。考茨基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独立的流派，因为它无论在群众中间或在投靠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中间，都是没有基础的。但是考茨基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利用属于过去的思想，竭力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坚持前者和后者的统一，从而提高后者的威信。群众已

① 《劳动呼声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公开报纸，其前身是《我们的呼声报》。

经不再跟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走了；劳合-乔治在英国工人大会上受到了斥责，海德门退出了党，列诺得尔和谢德曼之流，波特列索夫和格沃兹迭夫之流全靠警察来保护。考茨基主义者暗中掩护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行为，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考茨基派最常散布的诡辩之一，就是以“群众”为借口。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脱离群众和群众组织呀！可是请想一想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吧。英国工联的“群众组织”在十九世纪曾经拥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就同资产阶级工人政党调和，而是揭露它。他们没有忘记：（1）工联组织直接包括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少数**。无论当时在英国或现在在德国，参加组织的人数至多占无产者的五分之一。决不能认真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数无产者包括到组织中去。（2）——这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参加组织的人数，而在于这个组织所采取的政策的主观实际意义：这个政策是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即为群众从资本主义下得到解放服务呢，还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代表少数人同资本主义的调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现在的德国等等的真实情况。

恩格斯把“**最低层群众**”即真正的多数同旧工联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分开，同享有特权的少数分开，并且向这个**没有沾染上“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的真正多数**发出号召。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于此！

我们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估计到，无产阶级中间究竟有一部分人在现在或将来会拥护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只有斗争才能证明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决定这一点。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的人”只代表少数。因此，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

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们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在出卖群众利益，揭穿他们维护少数工人暂时的特权，揭穿他们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揭穿他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这样也就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们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停战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用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经验揭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丑恶本质而不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想就这条同考茨基主义截然相反的路线的主要特点作一概括的说明。

(选自《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83—898页)

修改党纲的材料* (摘录)

2

党纲的理论、政治等部分的修政草案

总纲的末尾（在“具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以后）增加下面几段话：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资本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大量积聚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资本向外国的输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规模，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联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飞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的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

* 《修改党纲的材料》，写于1917年4月，是列宁为1917年4月24—29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写的材料。这里摘录的是《材料》第二节的一部分。

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这个时代已经开始。

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如何困难或可能遭到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存在这种客观情况，当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从各方面直接准备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以实现包含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

（选自《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427页）